



商域与宗族： 杨柳青商镇形态与基础结构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0)03-0082-12

●周 泓

[摘要] 商是中国传统社会既有内容。近代以降,中国的乡缘血缘宗族已衍生出市镇商域宗族,家族商号是市镇符号及宗族类型。

[关键词] 市镇商域,家族商营,宗族类型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整体是商农合一的社会,乡村一直被学界认为是中国传统所在。那么其商业文化成分如何?地方模式有无忽略商的传统及类型?宗族有无商营功能?业缘与地缘的关系怎样?镇民记忆的符号何在?商与商、商与官、商与农人的关系如何?镇是联结村和市的枢纽,农人不全靠地为生,镇不完全基于商业形成。

一、地域构形、聚落类型、空间分布

施坚雅所研究的四川盆地农村,聚落多为散居式,不似一般华北农村内向封闭式的聚居式村落。江南水乡则市场体系较为发达,虽然乡村聚落仍保持聚居式村落的基本特征,但农民日常活动远较一般华北村民涉足更多的市场生活。杨柳青类似于江南的村庄,介于四川盆地与华北平原农村之间,因而杨柳青镇的格局是二重的,即村落(自然与行政的)+市镇——御河南岸的村落+御河北岸的市镇这一格局,是村民+市民的社会。大村落都建在几条河的岔口,房屋建在河道附近。杨柳青整体由于村落+市镇之构成,城乡联系较华北其他地区密切,水运使农民购销范围远大于北方集市交易区域。^①民国时期,杨柳青土地立契现象频繁,土地交易圈远大于村庄土地市场,华北其他农村同族先买权的民间习惯法,在一定程度上为城乡间密切的经济联系所突破。租佃深厚,

^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128.



农必兼贾。商人购地置产而地主化,地主多出租土地而商人化。相对而言,御河南的地籍观念比御河北要强,村籍已经成为非成文法的制度,因此,杨柳青的外来移民几乎都是在御河北岸街区,南岸则保留着内地村落文化成分,即御河北岸是传统市镇中以鱼骨街为中心的居住格局,御河南岸则存留着传统华北乡村内聚封闭型居住格局。^①

杨柳青御河南原是盐碱地,主要有渔业、盐运,不产粮食,河运停止后人们于运粮河岸耕田种地,御河北是粮田、菜地,有漕粮转运,所以杨柳青大粮户、地主、富商大都在北岸购地置房兴产,开店铺立字号,经营商业的遂多,“村民从集镇周围的农人手中购买其贩卖的东西”^②,形成镇商业中心。故杨柳青镇结构为:御河北是商街、店铺,御河南为农户、船工、渔民及画工。镇的主要大街河沿街、估衣街、猪市街、菜市大街、席市大街,大的字号和豪绅石家、董家、周家、安家、乔家、戴家、曹家、齐家,大部分药店与众多商号,都在河北岸。

御河北岸原为农区和上层阶级居住区,后为商镇中心,现在是区政府所在地。这与西方城镇空间架构相异。据20世纪20年代伯吉斯同心圆理论,近现代城市的空间结构一般是:城市心脏地带是商业中心区和行政机构,第二层是过渡区,包括批发业等,第三层是下层阶级居住区,有较便宜的住宅,第四层是中产阶级居住区,有小企业经营者、小商人、小职员住宅,最后在城市边缘是上层阶级居住区,多为私房,独门独院。居民的地位与离城镇中心的距离成反比。这与中国城镇、市镇空间居住的同心圆结构(离市中心越近,地位越高)正好相反。20世纪30年代后期,霍伊特提出扇形理论,认为城市的空间结构是由中心向外发展,形成楔形地区,主要的市中心被划分成工商业区、下层和中产阶级住宅区等。同样,地位愈低,距离中心愈近,即西方的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或许是不一致的,而在中国城市中几乎是同一的。

御河南聚落共同体意识深厚,“具有排斥陌生人的倾向”,^③即村庄作为一个整体存在,村内村外在村民内心深处是两个迥然相异的世界,“仿佛有一道壁垒立在村里人与村外人的心理边界,壁垒内是很近的世界”。^④御河南清明时的祭祀圈与庙会圈是村落的重心,现今是乡镇、市镇镇民的祭祀中心,是镇政府和地方社会力量所在和民间信仰中心。

御河南内向型农业社会与御河北外向型商业社会,亦或是递进的阶段。御河北与御河南形成市镇与村际连带组织。坡普金考察村庄内部的分化和非均质性,发现村民中常潜在有通过与外部结合而获得利益与权力的动机。^⑤杜赞奇认为黄宗智过于强调村庄的自我封闭的一面,进而易忽略文化网络中乡村与外人间的联系。^⑥北岸商镇组织功能显著,南岸村落与信仰组织功能突出。家庭手工业同商业性农业结合,导致了小农对市镇经济的依赖,奠定了商的作用空间。整个乡、镇形成了农、商互补与结合。

杨柳青镇历史地名显示御河北之属性。以宗姓标记的地名,如御河北岸的石家大院、安家大院、董家大院、戴家胡同、潘家胡同、曹家胡同,御河南岸的张家园、李家园、小梁庄、小刘庄。行业地名名称,北岸的如估衣街、席市大街、菜市大街、糖坊胡同、染坊胡同、南岸的如耕读胡同、饭店子胡同、前后义合庄。语义地名,北岸的如福祥胡同、财源胡同、富贵胡同,南岸的如厚谊胡同、朴实胡同、贤德胡同。以善堂和寺庙命名的地名,北岸的如裴元堂胡同、佩德堂胡同、鉴心堂胡同,南岸的如龙王庙胡同、三官庙东西大街、佛爷庙大小胡同。

可以看出:1. 御河北岸是杨柳青镇主要的商业区,商业是其重心,南岸是农耕社学乡村。2. 北岸是商业

① 参见[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231.

②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5.

③ [日]岸本美绪.伦理经济论与中国社会研究[A].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332.

④ 李银河.生育与村落文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64.66.

⑤ 参见[日]岸本美绪.伦理经济论与中国社会研究[A].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332.

⑥ 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98.

集中地,亦是善堂、庙宇集中社区,因此寺庙并非只是村社乡民的聚合标志,也是商民的聚合标志。善堂的修设,表明其没有与传统的孝悌理念相脱离,只是生存方式所祈求的途径有别。3. 民国时期杨柳青的宗族和业缘观念持续明显,地缘、族缘和业缘联结。

二、商型乡镇的成因

(一)环境

1. 河运码头。元明清三朝南来漕粮的重要通道南运河,穿越杨柳青镇区南部。2. 近津港(距津 30 里)。3. 津浦铁路枢纽。4. 地少。a. 地少而碱。农民兼业以应对狭小耕地经营的选择,促发了商业和市场。b. 地少而好,农闲,省劳力。c. 外来人多,使得本地人外出他营或经商。5. 水患频繁。灾荒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家口接济手段、生存渠道、生计方式之补救改变,社区重建办法之完善。在此,失地农民借债或个体外出行商,乡绅豪商租贷或借贷,绅商善社之义举,是通常的行为选择,因而,行商、借贷、善施成为杨柳青商镇私营、商用和公益社会的文化底色。6. 赶大船、“赶白沟河”和赶大营的传统。赶大船的小本经营摊点和代客加工的饭铺便于荒乱岁月留业,成为杨柳青小商业经济的先声。赶白沟之河运与营销传统成为杨柳青商镇经济的本色。赶大营、买地盖房成为杨柳青的从业习俗,同时大量青壮劳力赶西大营,形成了杨柳青女性家庭手工业。河船、灾荒与战乱,使杨柳青生成和传承着商贩圈层——非固定大型经营者,变动、动荡使中小商人易存,形成了行商群层,而流动的商贩恰是沧海桑田历史中的过渡景象。

(二)制度

1. 漕粮专运。漕运^①是津市及其郊县第一大经济基础。金、元定都燕京,但经济重心仍在南方,南粮北调。清承明制,漕粮北运为国策。粮商均居天津及杨柳青巨贾之首,在津商会中占六分之一。2. 盐业。是杨柳青早先与渔业、河运同行的母本行业,盐业官营专营,成为了天津和杨柳青第二大经济支柱。3. 开埠通商与海运。沿海航运、海运和陆运相继取代了内河航运的地位。杨柳青码头萧条,大批纤夫、船工、农民外出行商。4. a. 土地集中(商家购地)。b. 宗族性质与田产制度使土地碎化。5. 农业手工业向商业手工业转化。近代工商城市兴起,大批乡绅、士绅涌入城镇,城乡、职业、阶层流动频速,使“离土不离乡”、“离土又离乡”和“离乡不离土”(绅商、商绅)、“离乡又离土”(军绅、学绅)社会化。6. 科举制停废,士人立身正统准则转变,到正统结构外寻求更有利的生存方式,促使士向商人流动。7. 新政。汉族官员在清政府中地位的增强,使以之为主的地方势力增加。巨额的军费和行政开支使国家政治重心下移。“饷源”的筹措成为“新政”成效的关键。地方财政权力扩张,新兴实业界领袖成为政府之外的一个领导阶层。8. 从“抑商”到“重商”,从“四民之末”到“四民之纲”——“以商立国”政策确立。

(三)粮运

杨柳青耕地少,居民用粮大部分靠从外地采购运供。山东船户石万程为皇家运粮,因杨柳青近距天津,又

^① 漕运,官办运输,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国家为供应京城或接济军需,将各省征集的粮食、军需、物资,从水道解往京师及诸指定地点,秦汉时即已开始。秦始皇曾将山东粮食运往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做军粮。汉初每年自山东运至长安的粟谷数十万石。汉武帝时,开凿漕渠以缩短漕运路线,运粟多时曾达 600 万石。隋王朝除利用黄河、长江漕运外,先后开凿广通渠用于漕运关东之粟,开通永济渠用于疏通河北水道,通济渠则连河、淮、江三大水系为一系,奠定了大运河的基础。隋炀帝时漕运畅通,积粟多达 2600 万石。唐代开元、天宝年间,运至关中的漕粮约 200 万石至 400 万石。宋代建都开封,东南和西北粮食分别由汴水、黄河、惠民、广济四河输送。北宋时,岁漕粟 400 万石至 700 万石。金元定都燕京(今北京),南粮北运。明初建都南京,后都北京,明、清两代,东南漕粮 400 万石。(据《杨柳青镇志》蓝本“粮运”)。清代漕运沿袭不变。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军占领长江下游各省,截断南北水道,时经运河漕运京师的仅苏北、山东两地。至光绪二十七年,清廷始令停止漕运。



因子牙、大清等河运输方便,遂在此定居,开设了万兴粮行,开始由其父石衷一和其子石献庭^①经管,石万程本人主要借漕粮运输而采购。至三世,于道光年间富甲杨柳青,成为天津八大家之一。嘉庆六年(1801)杨柳青地方治理河淀,出现了大地主,扩增粮行,官方并设斗局。当地粮商双盛杜家、庆源刘家、庆成安家等十多家,或以自家大船采运储存,或代客户寄存囤积,收取栈租或抵押放款。后起的大粮商文义永杨家、利兴栈朱家等去津市经营,或在天津长年租客房贩售,或运卸天津交由斗店代存代销。杨柳青主要有万兴公、镜义粮栈和西帮文义厚京货店的春毓公粮栈。官斗局为杨柳青镇中心,石家为杨柳青八大家之首,当地士绅、绅商在津当议员、商会代表。

三、民国杨柳青商镇形态

(一)银钱业突出

1. 银号、钱庄之兑换、汇兑。杨柳青因是漕运要道,货币流通和借贷行为频繁,经营存放款的银号如振德银楼铸银锭、元宝,验兑银,将银楼、银号、钱庄合为一体。光绪年间,杨柳青谦益张家、聚德、裕盛董家、杨柳青支应局永兴利号均制钱贴、银贴以汇兑。尊美堂石元仕在天津开设万源银号、美善成银号。民国年间,杨柳青钱庄、银号主要有:大安起钱庄,存贷户达5000家,玉成号钱庄,地下银库18平米。^②另外,祥盛、裕丰、万兴、庆瑞和、义胜、义兴、大康、锐生、永生、同益、永和等在等银号,皆为家族钱庄。还有十几家银号没有在县、镇府正式登记,未在市钱业同业公会备案。

2. 地东兼商主兼作银贷。杨柳青大商人、大地主、大银号多合而为一,银号、钱庄大都由商家兼地东以商营利润放贷或出租土地,农民多仰给于地主放借或银号设账庄。民国初年,天津八大家之一正兴德穆家茶庄,在子牙河北有地3000亩,将其中1360亩地委托杨柳青老戴爷代管,戴成为二地东,置房2所20间,置地700亩,开了玉成银号,经营存放款,在杨柳青镇银号业中位居第二。至年老,将穆家地13.6顷传给族侄戴恩俊,^③开恩成银号,代替玉成银号做穆家二地东,既存放款,又转售粮食。

3. 绅、富、商相互支撑。由杨柳青移住津市的地绅商绅在郊县的大量土地由银号受托代收地租,如聚德的董绍康地约千亩,文丰泰安地地4000亩,兴泰和资东地2000多亩,都由庆玉号代存地租。庆玉号借以资金置上乘地1.8万亩,并在津市购房5所近200间,开办大货栈,兼营银号业务,与其联营者十余家,津市大陆银行商董齐氏和新疆津帮的天瑞、谦义、和生、正丰裕、敦城、福顺、太和记等40家银号,都是庆玉号的支持者。^④故地方各项税收、电力费用及公益事宜等所收款项,亦交于庆玉号收存。另外,祥盛银号由明盛周家、元兴宋家和成兴平韩家合资开办,存贷者400多家。裕丰号主要行贷于粮商粮贩。

(二)典当、抵押、借贷等契约关系发达

租佃现象与商有密切的关系。田产断难敷用,故农必兼贾,商虽不营田产,却多“小土地出租”者。而地虽出租,家计收入却并不仅仰赖于地租,只求佃户代纳税粮。“经营地主”是把土地租与他人而自己全力经商者,“远胜于积金者分外营求,徒多扰累者”。^⑤与“租佃制”相联系的“商人地主化”,“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成为农商社会的传统,许多商人购置地产,不少商人从事与自然经济紧密相联的高利贷经营。

1. 绅商当铺。大商号兼营典当。杨柳青大商家大都兼作银楼、当铺及土地经营,即商业、钱业、典业和土地多为大商号并营。杨柳青的典当业始于明代,由晋商经营。1862年,天津县令以镇无当铺不便民,号召绅商投资开办。杨柳青首户万兴公石家开办了万顺典当,天津长源号杨家开建中兴当。此两大典当在天津及郊县

^① 一说,“石衷一的儿子石万程和族侄石献庭于1785年在杨柳青开设了万兴粮行”,依据来新夏主编.天津的名门世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即石献庭与石万程是堂兄弟。

^② 杨柳青镇政府编印.杨柳青镇志[M](蓝本).第十二编 财税金融,第16页。

^{③④} 杨柳青镇政府编印.杨柳青镇志[M](蓝本).第十二编 财税金融,第15页。

^⑤ 《知本提纲·农则前论》,《知本提纲·农则耕稼一条》。

胜芳、信安、静海、武清、固安、白沟等地各有典当数十处,如石家万字号典当有固安县的万生当、信安镇的万福当、唐官屯的万吉当、胜芳镇的万聚当、杨柳青的万顺当及永清当。北伐后,中兴当又开与天津当铺有联系的“代当”数家,如宝昌代当、宝和代当等。德益代当,百姓称小押当,抵押品超过日期则转入天津当铺存库,抵押人去津办理或交手续费,可委托代为赎回。20世纪30年代,德益代当经理按津市典当业制度又开办仁和当,抵押期限为一年半,赎取计息五舍六进等。杨柳青西帮八大家之周氏同盛和号、复泉涌号,贾家振丰恒号都经营典当业。

2. 土地典当与转售。通常当铺主要接受动产实物抵押,而津青典当接受不动产做抵押,表明商业契约关系发达。典契关系以土地做保或以地租或农作物做抵,属于地权转移的一种方式,往往是土地转卖的先声。典出土地者都是需求耕地的中农、富农、贫农,^①而地主集中土地主要采用购买和典入方式。典入土地是否出租,全由典主决定。在典当期,华北地方“租不拦典,典不拦卖”,即佃户不能阻止田主典地,典主不能阻拦田主卖地,典入的土地转典第三者,立转典契约,称“转当”。典主典当的是已出租的土地,反映明显的连环契约关系。典后土地或由原佃户承种,典主收其租,或典主另觅佃户,如戴家玉成和恩成银号转租津市地东正兴德穆氏的地。嗣后原出典人直接向第三者回赎。转典价通常低于典价,典价与转典价间的差额归于最后一个典主,^②反映重叠的契约关系。

3. 土地抵押与民间卖契。与土地典当不同,土地抵押是一种真正的土地买卖关系,最终形成地权转移,有时则以地权买卖的形式表现,然而不立卖契而立典契。按照清政府规定,民间土地买卖成交后,买主应执白契到县政府办理田赋更名手续,叫作税契,再加盖公章,粘贴契尾,成为具有完整法律效力的红契。契尾是一种官方文书,由各省布政使司刻印编号,发给各州县政府使用。另有一种红契系由官府统一印就,买主执白契办理税契时由官府发给用印。

清至民国,私有土地所有权凭证主要不是官府执照,而是私人文书与官私契约“卖契”(白契、草契、推契)。税契过割是订立土地契约时不可缺少的手续,但民间土地交易时没有税契者甚众。白契是相当常见的一种没有官方正式确认,而为田主手书、民间公认的地权书。杨柳青草契与白契相同,为白契的一个别称,且天津县府亦制行草契。这说明习俗承认、不经过官方备案的交易之合法性。

在杨柳青档案局全宗案卷十件中,即有三份田房草契,380~382号民国二十六年至民国二十七年“义德堂安、王汝平地买卖田房草契”,383~384号民国二十一年至民国二十二年“王炳魁、存忍堂张买卖田房草契”,385~387号民国二十四年“张志英、张志朋、积庆堂潘买卖田房草契”。这表明地方法规对民间习惯法的附和适应。

推契又称退契、兑契、过契、认契,用于普通民有地之外的地权转移。在华北的推契中,绝大部分写“推(或退、兑……)与某人名下永远为业,任凭置主自便,不与卖主相干”等,有时直接写“卖”与某人,大部分推契代表的是土地所有权的买卖,实际属于卖契的一种,意味着以抵押、典当、出租等名义的特殊土地买卖,可以视为地权转移的补充形式。政府关于土地交易的法令及其赋税征收方式实际上不能限制地权的转移。“亲族优先购买权”在民国华北保存的地契及通行的契约中少有,杨柳青异姓间地契商业借贷抵押关系发达。

附 杨柳青地契两件

(1)

德润堂周李氏(卖契)

土地买卖契

民国十三年

三益堂张(买契)

立卖种养地契人 德润堂周李氏 因已用今将祖遗应分、坐落杨柳北青当村西南西四顷地一段计地壹顷肆拾亩凭中人说合 情愿出卖予

三益堂张名下永久为业 申明每亩时值银洋九元 共合银洋壹仟贰佰之拾元整 其洋矣下交足不久 并无

① 据《社会科学杂志》7卷1期,第8、16页数字。

② 民商事习惯调查录[M].台北:进学书局,1969.221.247.



私债折准等情 自卖之后尚有弟男子侄以及邻佐争竞为碍者 偿有卖主一面承管 不与买主相干 此系三面言明家情 愿名无返悔 恐口无凭 立卖地契永远存此。

同中人 张荫亭 十

立契种养地契人德润堂周李氏 十

中华民国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2)

荣庆堂周(卖)

土地买卖契

民国十三年夏

同亲友 高子安

三孟堂张(买)

历甲子三月初三

张祝九 押

随交原买印契壹张

立卖地契荣庆堂周 押

4. 高利借贷农资运作。乡镇高利借贷是维持、延续农民生计的必要环节。村民借贷信用方式一般以土地等做抵,这往往成为土地兼并的杠杆,说明土地兼并亦意味着商业行为。杨柳青所属的津县,地亩少而欠赋少,可说明此地贸易和借租关系强;反之,其他几区,地亩多反而欠赋多,说明其地贸易借贷关系弱。在此,牙行经营高利贷亦为惯例,商会给牙行高利贷行为作庇护。寺庙也从事高利贷经营并得到官府的认可,尤其是灾荒年借贷频繁,寺庙从事典当业,经营出典地,不少寺庙是由最初开办当铺而来。民国杨柳青银业、典业同业会社与机构有典当、票号、银号(钱庄)、银行、典当业公会、钱业公会、银行业公会、保险业公会、民间老人会、攒钱会、寿缘会。业务如典当业务、票号业务、银号业务,从事存款、放贷、汇兑、结算、发币、信用、代理、拆借。

(三)中介经纪“牙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地衙门直接依靠某项牙捐作为行政经费来源。河南、直隶等地的米麦杂粮,大都经南运河、大清河、子牙河运至天津,转卖于津京的粮商,此类交易都经官府特许的斗店说合成交,由斗店过斗和做财政担保,即官府一牙行一商人为财政控制方式。买方要向斗店支付佣金,其中包括斗店要向官府缴纳的贴税。地方某一政府部门特许专业牙行,如官粮由海上运津,准粮船带免税货物,也经牙纪交易。津对地存放于店中的货物抽取佣金,杨柳青对不“投店”的御河鲜货交易客商按货值征收“过河用”、水果帖等。另外一种牙行即“自由经纪人”,津人称“跑合的”,专事中介业务,成为不熟悉北方市场的南方商人的全权代理商。民国后行业增多,牙行更为活跃,各行业“跑合的”愈多。^①

(四)边缘商人:小商贩与脚夫行

清代天津人口统计中有“负贩”。民国初,在天津商会的调查中,“沿户或路中买卖货物者”称作“小卖人”或“小卖商人”,后国民政府称“摊贩”。^②摊贩一般作为群体经营者而存在。传统城镇中,摊贩往往在人口密集的街区、商业中心、河岸码头或者庙宇前自发形成专门的露天市场,如杨柳青的席市、菜市、猪市。商贩通常于拂晓和夜晚上市,门市坐商开门营业时则收摊夜市。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每天早晨到晓市趸货。民国年间流动的小贩占相当的部分,小本经营的摊贩和拥有店面、字号的铺商共同构成空间相对固定的市场和商业系统。许多摊贩都从大商家进货,走街串巷的小贩又从摊贩那里趸货,因而商家与小贩之间形成一个商业链条。另外,一些行当主要由摊贩经营,如旧物业、估衣业等,也使得摊贩与当铺之间形成共生的关系。小商贩是传统商业的代表,也为传统市镇的一种标志。

脚夫行也称起御行、搬运行、脚行,当地俗称“耍胳膊根的”。近代天津及杨柳青河道、码头车运船载的货物都凭人力搬运装卸,因此脚行成为当地不可缺少的行业,通常为商家、百姓搬运货物。另外县衙门“迎官接差”的“官脚行”,是最早的职业化脚行。康熙年间,天津出现私人脚行,向官府交纳“报效”,民国时期仍很普遍。

① 参见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571~572.

② 引自刘海岩:《空间与城市——近代天津城市的演变》[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18.

杨柳青脚行沿运河岸分布,由于当时船舶运输以粮食和盐为大宗,因此脚行也以搬运粮盐为主。随着火车站和铁路货场的建成,脚行分化出码头脚行和铁路脚行,分别垄断车站和货场的货物搬运。行头或脚夫都由本地绅耆做保。脚行持掌的地盘称为“口”,按街道里巷划界。脚夫多为本区居民。界内商家铺户的货物搬运只能找本地界脚行,不得越界运货。《津门杂记》记:“天津扛抬帮,谓之脚行。向系分门别户,把持街头,每以争夺生意构衅,动则挥拳持械,两不相干,谓之争行市。”^①官府向脚行颁发“谕贴”,民间称“龙票”,张贴于街巷,以示官府承认脚行的“地盘”。直至上世纪50年代,天津旧城区脚行的这种划界方式仍然存在,有的脚行地盘仅一两条胡同,却仍然维持。划定后的地盘成为脚行头的产业,可以世袭,也可以出租。脚行凭具“签”世袭,大多数脚行头都有一支或几支祖传的“签”,代表其控制脚行的正统性。持有祖上传下来的“签”,可以占地段、揽生意、雇用工人,“签”象征着权力,也是“股份”的象征,代表着脚行的产业。“签”的世袭只能嫡传子孙,形成脚行“世家”。“签”可以典当抵押或转卖,上世纪40年代,一根“签”已达数百万元。^②

(五)家族商营

1. 族缘与业缘。乡镇社会业缘与族缘不可分,行业多为家族经营,同业会馆公所的成员,往往是家族及宗族性的帮、行、号、店、铺等。本小力微的中小商人更以族人为基本经营力量,合资多由族亲姻戚或同乡,店铺中各伙计多为族人、乡党,佣工也多由族中佃仆充当。杨柳青年画业是典型的家族手工业。张开亮的祖父张文柱、父亲张天恒都以年画加工为生,长兄常年给镇南年画乡加工年画。张开亮善刻制精细的画版、套版,曾刻制大幅“六典黄河阵”画版。王振邦于光绪年间拜岳父为年画师,王振邦的三个儿子均终身从事年画业。张家窝村年画裱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是张洪生作坊,张的五个儿子都从事年画裱糊业。房庄子村房荫枫祖孙三代以年画佛像闻名。翟文彬的祖父翟长青、父亲翟国森都是终身作画的艺人,画品销至京县。宫庄子村王学勤家族是三代从事画行(商号)的知名家族。大沙窝村的杨柏光、杨柏起、杨万普、杨万桐的家族自画自裱。以年画为家业相传的亦如玉森祖孙三代,等等。杨柳青的建筑作多以家族而名。贾家作起于明末贾耀和曾祖,至民国时已传到第五世——贾耀和、贾耀田、贾耀海、贾耀清,曾修文昌阁、玉皇庙、紫竹庵。周家作传数代周氏族人,曾建石蕴轩宅院等,清末西帮同盛和商号创始人周乾义曾为石工,复泉涌字号创始人周乾钰曾为木工。杨家作于光绪间传至第三世,领作人杨如金、杨如春、杨如和相继承接,民国二十年代修裕盛董宅。白家作由白永泰、白永和兄弟领作。民国后杨柳青又有赵家作、于家作、高家作、徐家作、何家作等。

2. 商与家族。“农家的上升大多是由购买土地所致”。^③而市镇中的商人一旦破产,一般地说他不会退而求耕,而是在市镇中选择低一档次的职业,当不成商人就选择做商贩。

家族是商人的内层依托组织,是生产、消费的单位,又是投资的单位,在传统商人的发展尤其是在其上层的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9世纪,天津人就把本地商人中的巨富称作“八大家”,显然人们更认同家族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天津华氏以长芦盐引维持大家族生活历八代。商人家族大都经历由核心家庭转化为几代同堂的大家族以及子孙分居析产的过程。富商间常以联姻结成社会网络,且与军阀、官僚联姻,抬升家族的社会权力与地位。大家族要保证人财两旺和每代子辈田产不消减,需要经营商业,其利润再投于置地,同时捐学以资族人,捐绅以立族兴宗,因此宗族与商营同步扩展。而此基于家业传递与宗祧传承互为动因,基于贾儒互通的士商理念。

3. 家族的商营功能。这种功能在于:大家庭对家族营生的人力与财力给予支撑,宗法式、家族式管理,家族商号是商营家族兴业与竞争的途径,形成家族和地缘行业垄断,族学或捐学以资族人,从底层或内部催生或助发商和绅的合一,商人各个层次的转型升级,依托亲缘与地缘网络,股东间多以家族、姻亲、乡党关系为纽带而结成同业之僚,族缘及乡缘圈层信任机制的功能亦在于分家后族内仍然合作,家族使商营的资产和意

① (清)张焘:《津门杂记》卷下[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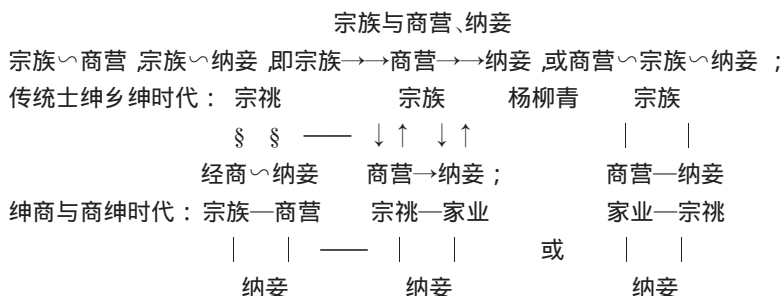
② 刘海岩:《空间与城市——近代天津城市的演变》[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716.

③ Martin C. Yang. 1945. *A Chinese Village Taitou, Shantung Provi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132.



义伸延与升华,商缘结官,联官第仕阶之姻。杨柳青绅商石家在第四代宝子辈,分福善堂、恩绶堂、天锡堂、尊美堂四门。长门福善堂咸丰年间又分为七小门:敦厚堂、聿修堂、燕怀堂、元吉堂、尚纲堂、九思堂和裴元堂。次门恩绶堂分为六小门:承德堂、锡福堂、三德堂、润德堂、裕德堂、怀德堂。此外,尚有13个较小的支堂以及其下更小的堂,如厚德常、伴鹤堂、燕庆堂、正立堂、三镜堂等。自宝字辈始,福善堂、恩绶堂以武举、官第为要,而天锡堂、尊美堂以财势威望居重,互为支撑。大家庭中从事诸种职业的选择和可能,是其能够形成势力和实力的原因之一。

在此,商营、家产与宗族—职业分立,伦理为本位,亲族不绝产,分家而诸堂协作,家产继承的意义在于宗祧继承,行商纳妾亦循宗祧伦理,如图(“~”、“\$”表示“联系”,“→”表示“作用”):



笔者赞同孔麦隆的观点,析产分家也是家族财资积累的一种结果,亦是分余节流、保存实力,分散积聚、扩大势力的一种方式 and 过程。郑振满将宗族存在分为血缘继承式、地缘依附式、利益合同式三个阶段。笔者认为,宗祧延承、聚族依托和族产互利是重叠互补而非分立的。

4. 家族字号。它是宗族“控产机构”的延伸。商号是商镇的构成元素。津市与杨柳青均有“八大家”之说,其与明末清初天津的海运、粮业、盐务直接关联。津市老八大家为天成号韩家、益德裕高家、杨柳青石家、土城刘家、正兴德穆家、振德黄家、长源杨家、益照临张家。其中依盐务立族者高、黄、杨、张氏,依粮业立足者石、刘、穆氏,依海运业立足者韩氏,兴族后均广置田产,成为大地主。民国始,新的豪贾投资典当、粮食、银钱号、绸布、杂货等业,出现新八大家——李善人家、益德王家、乡祠卞家、高台华家、元隆孙家、敦庆隆纪家、同益兴范家、瑞兴益金家,他们属于新兴资本阶级。亦有按行业区分说的,如“钱业八大家”、“棉布业八大家”等。杨柳青八大家亦以财富声望而论,是对家族实力地位的认同。八大家之首系粮商兼营典当的绅商石氏,其次有聚德、裕盛董家、同盛和周家、明盛周家、成兴号韩家、文丰泰安家、鼎兴张家、恒字号王家,民国后补进双盛杜家、汉升韩家。

同样,杨柳青人在西营地亦形成以商业实力而著称的新老八大家。老八大家是改营坐商最早的新疆津帮商户,开业于建省初,因代办协饷支军之功得到官方肯定,继而做中苏边境贸易,在迪化以同盛和、复泉涌、永裕德京货店名声最盛,其次有德恒泰绸缎庄、公聚成京货店、升聚永京货店、聚兴永京货店、忠利祥京货店。宣统二年,陕甘帮火烧津帮八大家后,转向分散经营。清末民初,新疆津帮又形成新八大家:怡和永、福泰成、宝聚成、裕昌厚、广兴和、新盛和、同泰兴、德兴和一德生堂商号。杨柳青西帮家族连庄字号如:周氏同盛和号在迪化、伊宁、霍城、古城(奇台)、吐鲁番、阿克苏、焉耆、喀什、和田、归化(呼和浩特)、武汉、天津、北京、上海、广州、香港设分庄约二十座;安氏文丰泰号在伊宁、惠远、额敏、塔城、阿山、布尔津、古城子、包头、天津设分庄十余座;郑—杨氏永裕德号在迪化、伊犁、喀什、古城、天津设分庄数座;周氏复泉涌号在迪化、伊宁、绥定、天津设分庄数座。杨柳青人赶大船和赶白沟河的营运,亦立家族字号,在白沟有明盛周家、恒义源王家、春毓永杜家等家族铺号约百家。家族字号是宗族“控产机构”的延伸和市镇商域宗族类型。

5. 家族买办。买办的职位虽然由买办与洋行经过契约达成,但实际上许多买办的职位往往世袭,这种承袭方式大都得到洋行认可。天津不少买办的华账房大都是家族或宗族式的,雇佣的人员或为同族,或为同乡,没有亲缘或地籍关系的人难以立足华账房。横滨正金银行华账房的成员都是魏氏家族及其亲友,外人无法涉足。怡和洋行成为买办梁炎卿及其三个儿子的世袭产业。英商太古洋行由买办郑翼之及其长子郑宗荫之三

周 泓·商域与宗族 杨柳青商镇形态与基础结构

子郑慈荫继任。德国礼和洋行买办王铭槐,其子孙几乎都在德国的洋行或银行做买办职员,尤其是德华银行在天津和济南分行的华账房,长期被王氏兄弟掌控,其孙辈仍大都以买办为职业,成为买办世家。民国后,天津商人出身的买办更嫡传子辈,新泰洋行宁紫垣继承了父亲宁星普,仁记洋行李吉甫兄弟继承父亲李辅臣,横滨正金银行买办由魏信臣之子魏伯刚继承。杨柳青安文忠之子曾做洋行买办。洋行雇佣买办看重亲族或同乡关系,或许基于一种观念,父传子继的方式与中国的宗法制度一致,血缘或亲族关系是最好的信用。

(六)业缘组织

1. 行会与商会。在传统乡镇或市镇,行会与宗族和地域组织一同,在相当大的程度和范围中左右着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行会规划同行的功能为其独有,且与乡族联结,故行业或业缘性的增长,意味着基于区域或家族的业绩的提高。宗族、行会、乡亲相对于学校、工会、商会,是一种首属群体,常以直接、亲密和个人的方式交往,规模较小,成员间有深厚的情感联系,因而,行会具有经营、祭祀、救助诸功能。民国杨柳青行会有银钱业、金店业、洋行业、绸缎业、广货业、粮商业、粮店业、磨房业、大米业、姜商业、杂货业、颜料业、洋布业、木商业、茶叶业、洋药业、瓷商业、海货业、南纸业、书铺业、帽商业、皮货业、鲜货业、竹货业、洋镜业、铁商业、鞋商业、油商业、栈房业、药材业等。其中银钱业同业会社有典当业公会、钱业公会、银行业公会、保险业公会、民间老人会、攒钱会、寿缘会,业务为典当业务、票号业务、银号业务,从事存款放贷、汇兑结算、发币信用、代理拆借等。

行会不是由商会派生,而商会是在行会的基础上形成。每个商会以当地行会为主要成员和基层组织,众多成员由所在的行帮组织与商会联系和组织活动。行会联结同业小工商者和商会。商会整合手工业行会、同业公会、行业商会、同业商会、商业公会以及农会、水会诸业缘商团,统领商域实业团体。民国十二年(1923)天津县杨柳青商会成立,董事会制的商会成为联结镇民的核心,享有地方公益的权力、威望。但行会仍有独立性,往往具有地缘基础,即某一行业为同一地籍人操作。杨柳青年画的彩绘、裱画、运散主要在镇南,而勾描、套印、刻板之画师、画坊、商号集中于岸北。南乡三十六村是杨柳青年画的加工基地,薛庄子、古佛寺、宫庄子、阎庄子、小甸子村各户都以加工年画为生。小甸子村自清代至民国“家家都有版,人人做加工”。张家窝村以裱糊年画闻名,清末全村三百多户人家有一百多户从事年画裱糊。津市多处有南乡三十六村人销售年画的营业点,显现出业缘与地缘的叠合。故行会是商会与市镇的实体和基础。

2. 水会。亦称水局、水社,系民商兴办的消防组织“救火会”,采取会社形式,无实体机构,是商人的近代社团。杨柳青水会形成早于商会,因商铺数众,往往一家不慎,火及四邻,故防火为要。士绅人等筹办灭火器具,成立“支更水会”、“天安水局”、“离安水局”、“平安水局”等。光绪末年已建水局18家,后隶属于商会。会首依财产、品德、知识而推举,故富绅士绅轮任。水局自下而上由诸村组织,成为跨村或县镇的社团。酬神由单个祭祀形成乡民共祀,得到官方认可。

3. 商缘西延。杨柳青商人随左宗棠湘军西征赶大营,实现了其商性的西移。(1)经营边域政军重心——古城子兵镇“新疆货物集散转运中心”,惠远将军府和宁远汉人街“小天津”,省府迪化“小杨柳青”,南疆喀什噶尔之“汉城”。(2)亲族控产。杨柳青商帮在新疆经营家族商号数百家,如迪化津帮新老八大家,伊犁安氏文丰泰、振丰恒号等家族商号,这是其控产机构的族缘延伸。(3)移植会馆、水局、商会、赈济会(辅善社、同善社、十字会)、理教公所等业缘和乡缘组织,这是其控产机构的乡缘扩展。(4)移植经营种类货栈、银号、银楼、百货、饮食、药业、洗浴、手工业、工艺、新兴商业、租赁、杂挑和菜园等,并与边域洋行、外商做贸易,与当地族商形成了支放、押当等区域性经营方式,^①又把回货(药材、鸦片、黄金、羊肠衣、羊毛、棉花、兽皮等)运销津地,设连庄分号,中介经纪“跑合”,连同在天津的经营网络,维系与津地业界的联结,构成了其控产机构的业缘扩展。

黄宗智以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的二元视角,比较华北与华南乡村的不同特征,认为华北“商品化程度低,国家政权势力渗入村庄,……同族组织不稳定,而超族的村社组织却力量强大。”^②然而天津与杨柳青并非如

① 周泓:《群团与圈层:杨柳青绅商与绅神的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23~368。

②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1991,315。



其所述的“商品化程度低”。由业缘、族缘、地缘而形成的商与商、商与家族、商与伦理之联系,家族字号、亲缘股份、契约理念等,虽已不存物化组织符号,却存在于当地民众的心口之中,既有的乡村宗族研究模式不适合于杨柳青。

四、基础结构:商农街合与街村一体

杨柳青因是河船码头,耕地稀贵而又交通便达,故人地关系紧张,地籍意识突出。现今当地人多不转非农户口且维持“两半户”家庭。

(一)农商经济——本末兼联

1. 粮食为基础的经营。杨柳青南运河为漕运主干,运粮河沟通了大部分村庄,形成以之为主体的运输网和粮食商品交易市场。民国初,杨柳青粮业有磨粉业、米业、斗店业、油坊业、棉花业、饮食业和集市批发之斗店、斗局、粮栈、米市、米庄、米栈、面粉批发市场以及粮业同业工会、三津磨房,并形成粮商介绍、同业工会登记、验缴保证金的交易中介——经纪人。私商粮店约六十户,磨粉业大粮商如石家万兴粮行、董氏聚德号、裕盛号,韩氏成兴号,双盛杜家以及春毓、庆元、庆成、恒泰、德庆等商号,每处存粮数万石。^①镇内银号资金皆以粮食实物计算。

2. 经营方式。(1)以家户家庭为主,牌记用家族姓氏名。餐饮、手工业等基本行业,经营、字号大都以家庭、姓氏而立。年画以父传子、婆带媳家庭生产模式为主。(2)集市贸易。明初杨柳青御河沿出现估衣街、猪市大街货栈,形成早市、节市和集市集贸市场。早市,主要有菜市、果市、草市;节市,主要是肉市和画市(每年腊月十一日开市,出售各种年画、剪纸、吊钱、神像、对联,除夕收市);集市,五日一集,逢一排六,即一旬两集,主要为猪市、席市、粮食市、百货市、农具市、骡马市。这些农贸市场中早市之菜市、果市,节市之画市,集市之席市、百货市,地点与品类迄今延续,与坐商门市并存。

3. 杨柳青庙会联结着农与商。杨柳青佛道信仰并举,以民间信奉为主,庙会频多。由于交通方便,庙会期间,各地商贾与本镇铺商均于庙前百米长街搭棚设点。顾客有附近各县、镇、村赶会的香客与数以百计从外地乘车船进香看会者。镇内有一石碑刻“顺天府大兴县香会碑记”,载由京师组织人们至此进香看会的情形。庙会交易商品种类主要有农具、农药、农产品、麦秆编织品、地方风味礼品、香烛、风筝、土产、布匹、小百货及运购的香料和商品,促成了当地乡农和市镇经济的交融。

4. 农商文化之路径。清嘉庆时,杨柳青商号960余户,包括坐商329户,商贩139户,船运494户。^②民国杨柳青镇商业仍然体现着生活化和农商经济特点。1950年于工商联注册的杨柳青商号,主要有米面业、米面加工、肉类、糠铺、酱园、菜业、油坊、烟酒糕点、茶叶、副食杂品、鲜货、百货线店、棉花加工、打绳、成衣、估衣、染坊、纺织、木材、竹器、瓷器、文具、药店、煤铺、电料行、铁木业、自行车(新增类)等方面的商号。公私合营后,杨柳青商业种类仍同以前行业门类——制粉、棉布、百货、中药、杂货、蔬菜、水产、食品、烟酒、煤业、农具、服务业,仍属农商日用和生活消费类型。

(二)街村一体与“两半户”

明清时,杨柳青人口即包括农人和商民。民国时期,中心街多业主和商户,东、西边街地主、农户多。土改分了地主的地后,各街都有了农户,即每街都有了农民和市民。人民公社时有社员(农业社)、工人(城市人民公社)及小买卖者(零工)。自合作化到生产队,土地收公,1982年联产承包后又分出,所以,至今半农半商。杨柳青各街都有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因而,各街也就是各村。

全镇几乎每街都有双重成分的“两半户”家庭,一家中有市民,有社员。现时工人大批下岗,商户增多,公社时期是农、工“两半户”,现在主要是农、商“两半户”。据杨柳青街居民委员会的居民统计(2003年底),“两

^① 《杨柳青镇志》(蓝本)第六编 商贸粮油,第38页。

^② 《杨柳青镇志》(蓝本)第六编 商贸粮油,第9页。

半户”占居民户的 1/9,其人口占居民人口的 1/8。

“杨柳青镇村调查基本情况”(2004 年)显示,全乡各村,非农户占绝大多数,而纯农户少于兼业户,兼业户十分突出。兼业户指同时从事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农户,纯非农户为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不是以户口类别划分)。在抽样情况中,纯农户更少,约为 1 户。可见,村社中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和兼业户相当普遍。在笔者于 2005 年对杨柳青镇中心六、七、八街的居民调查中,非农(市民)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六街为 158 户,420 人;七街为 169 户,484 人;八街仅 77 户,207 人。

可知,杨柳青各村的纯农户和各街的纯非农户在同时缩减,而各村的非农户和各街的非市民户在同时增加,兼业户扩增,“两半户”持续。亦即农与非农,主要是农与商(兼业者)在相互双向流动和渗透,村民对市场的需求与市民(商民)对乡村社会的需求紧紧相连。同时,村委会有村办企业,且可为个人承包或买断。

在此,兼业户的增加和“两半户”的转型与扩展,并不完全意味着农转非(农)户口与之同步增加。前者无需改变户籍,而后者单向申改率并不甚高,仍然是双向互入互往的一种延伸。如七至八街,2004 年农户社员转为市民户籍的平均只有 10 户。

B 街村主任:“转市民户口的都是因为孩子,青年人愿意转或考学自然转的。”

B 街村委:“家长,尤其是老人不愿意转,转的人就没有地,转几个地就没了。不转,有地能分租,坐收利,自己还可以做小买卖。”

Q 街村主任:“你看户口簿上,一家主要是女人的,他们的对象(指配偶)就是市民。若剩母子,他们的媳妇就是市民。”

副主任:“现在有规定,一家两口,有一方是市民,另一方年龄够 35 岁,就能转市民,不分男女,孩子自愿。”

ZH:“就是说政府鼓励……”

村委员:“鼓励上交地,把地卖给国家。因为改成市民,地就要交公了。”

ZH:“改成分的多吗?”

村书记:“不多,每村不到 10 户。”

村委员:“社员有地起码吃喝有靠,温饱有着落。退休的每月还有 30 块养老工资,工人一下岗什么都没有,补贴不够养家的。街上做小买卖的好多是下岗的,有地就不下岗。”

ZH:“农民还有退休养老工资?”

村委员:“有,人民公社和合作化时候为公家干过的。”

村委员:“做小买卖的大都有地。纯小商户连下岗工资也没有,又不如工人。但社员可以把地租赁给政府,或者大企业、外商、个人,不像一次交公得的钱用完就完了。”

ZH:“地小或不好的地呢?”

村委员:“地少自己种也不耽误,不限制做买卖。地不好可以租给个体或者建筑队,比一次卖掉有保障。所以,街上的小业主很多是农民。”

其实,在一个家庭中,几人有几分或几亩地,几人做点小商业,应该说这是极好的组合。在此,二元互补与二元对立并行,有地能出租,保地为出租,社民任何人可以出租地给国家或任何企业与个人,村民与市民保持着农商和谐的“两半户”家庭,杨柳青维系着自身社会的传统——农商交融。

工、农、商并非三元对立,有功能的互相转换。清及其以前以农业为主轴,民国以商业为中心,共和国前期以工业为重心。杨柳青自明清以来即农、商并行,现今对于乡民来说,依然是商为助保,农为基保,工为劳保。清代与民国时,杨柳青的镇民尤其富绅、商绅,皆以本守末,农户、商户则以末兴本。

在史学、人类学、经济学界,乡村经济与市镇经济多分立而论,或二者划分于不同的社会历史过程中。然而,在实际和具体的市镇(县镇)经济中,二者实则是互通的。傅衣凌认为,市镇经济作为地主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这里除去意识形态色彩,则包含两种经济结合的可能。

清季,杨柳青各行商人积累了一定资本,大都用于置产经营土地,“以末起家,以本守之”,很多商人同时



又是地主,从事与自然经济紧密相联的高利贷经营。还有商人将大量资本投于建祠堂、办义塾、置族田上,使之成为宗族资产,而不是“纯粹的商业资本”。1948年,津管会进驻杨柳青,调查当地地主和资本家的不动产情形,发现较大的地主均兼资本家,因而类别划为“地主资本家”,登记项目为地主兼资本家的耕地、柳地及商号情况。

当作为经济资本的土地变为分化阶级的象征资本后,它所留下的印记却依然存在。

商绅后裔(居民):“种地种成了地主,谁还敢再种地?还是做些小买卖的好……”

乡社后人(村民):“只要地,不转非农户口,不交地。有地照样可以做买卖……”

五、结语

(一)商与汉人社会文化

中国被认为是农业文明古国,然而农与商分开过吗?汉人是农耕民群,汉人传统社会被认作乡社,那么,汉人传统社会中没有商吗?或者商不存在于汉人社会吗?

实际上,商亦是汉人社会文化,乡村农人社会没有离开过商人活动,中国古代出自商部落的商王朝即早于出自农业部落的周朝。经商被认为和耕读一样也是功名,且乡社教育与商业两者的黄金期是一致的。

(二)商镇类型之结构过程

地方社会的模式源于纳入国家制度过程的方式,亦是国家适应地方、基于地方类型的结果,或者说是行政形式结合或附和地方理念的过程。商镇结构过程是商营理念方式的地方制度化。国家在杨柳青基于商运之性,直接涉入经济渠道和命脉,设商会管理。粮商盐运、抵押借贷、契约结社、家族商号、乡缘业缘组成社会基础体系,即市场系统的层级为商营提供了文化空间,使商人“以自己的方式去做士大夫”,而从集资到分配都属于商业文化和社会史之研究。

不论是二元对立说还是三元社会说,社会分层或流动理论以及市民社会观,均无法解释杨柳青的街村一体形态,即商团与乡农的社会,它是往日乡镇保甲制时代商镇地保与村社保甲均系绅兼的民间承衍。实际上,商业与土地并非如在以往的研究中那样分化对立,而是有交叉和关系。

[收稿日期]2010-04-28

[作者简介]周 泓,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201

Business and Lineage: the Type and Basic Structure of Yang Liuqing Town

Zhou Hong

Abstract: Merchants and business are traditional societal elements of China. Since the 16th century, town merchant lineage has derived from lineages based on rural areas and blood relations in China. Family business entity is the symbol of town and a kind of lineage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 town's trade; type of lineage; family business